

呂妙芬，《孝治天下：〈孝經〉與近世中國的政治與文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408頁。

近人治經學史，多沿襲清人的問題意識和經學關懷，很少關注宋明理學家的經學成就。經學在社會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更常為史家忽略。呂妙芬的《孝治天下：〈孝經〉與近世中國的政治與文化》（以下簡稱《孝治天下》）雖以近世《孝經》學為主線，卻較少涉及傳統經學研究的校勘、辨偽及注疏等領域，而主要關懷兩個層次的問題：一是《孝經》與近世中國的政治和文化的關係；二是透過「中國近世《孝經》文化史」的視角，理解「孝」在中國文化中豐富而重要的意涵。作者特別提醒我們，《孝經》與「孝」既非同義，也不是簡單的涵攝關係，區分兩個層次之間的複雜關係，是本書研究的重要起點。

除序、導論和結論外，全書共分三部九章，書末附錄晚明至民國年間《孝經》著作表及徵引書目。導論簡介本書的研究主題、方法和各章內容，回顧「孝文化」的研究狀況，指出明清時期的《孝經》學長期遭受學界忽略。作者強調，明清時代是中國孝文化普及深入社會各階層的重要發展時期，而《孝經》又是少數能夠跨越身份、年齡、性別、宗教等界限的儒家經典之一。研究近世的《孝經》思想與文化實踐，有助於我們了解這段時期不同領域的歷史變化。在研究方法上，作者從政治、經典詮釋和儀式實踐等角度切入，呈現《孝經》與人們生活及思想交會的豐富景象。

第一部份兩章，為晚明《孝經》學的興起與發展提供長時段的社會史和學術史背景。首章主要從近世宗族制度與宗族文化的普及、宗族與政治權力的關係、落實孝道教化的途徑等面向，說明孝既是中國近世政治與社會秩序的核心價值，孝的教化也以多種形式在各種制度與媒介中被傳播宣導（頁10）。朝廷通過旌表孝德、聖諭宣講，致力推行孝治；宗族制定大量的家訓和族規，敦行孝悌倫理；社會上廣泛流傳孝子傳和因果報應思想。在「孝道」日益重要的背景下，作者引出下一章的問題：與「孝」密切相關的《孝經》在晚明處於何種地位？

第二章表明，宋以前《孝經》在政治與士人文化中佔據重要地位，元明以降，《孝經》逐漸從朝廷政治核心舞臺淡出，轉向地方庶民教化的領域，更多以蒙書的姿態出現。換言之，《孝經》在明代被定位為蒙書，失去了昔日的光環。近世孝治天下的意識日益增強，與《孝經》的卑微地位形成強烈

反差，晚明士人如何應對這現象？

第二部份便聚焦於晚明士人與《孝經》的關係，考證了晚明《孝經》的整理出版情況，並分析士人對《孝經》的政教功能和宗教意涵的表述，展現他們日常踐行《孝經》的儀式。作者將晚明《孝經》學分成兩類：一、從孝的政教功能立論而不牽涉孝感神應的論述；二、着重孝靈與孝德感通神明的宗教性意涵。上述兩種立論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

第三章詳述第一類立論，重點關注晚明江浙地區提倡《孝經》的士人群體。這群士人共同致力蒐集和保存歷代《孝經》的相關文獻，對導致《孝經》衰落的今古文問題、朝廷科舉政策和朱熹的《孝經刊誤》作出積極回應，呼籲朝廷重視這部經典，將其列入科舉必試科目。受陽明學影響，他們以新的方式詮釋和神化《孝經》。因應崇禎朝重視《孝經》的聖諭，這時期出現了兩部《孝經大全》。（呂維祺的《孝經大全》成書於崇禎八年〔1635〕，而非本書所認為的崇禎十二年〔1639〕（本書附錄，頁341）。詳細考訂參《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820。本篇提要為倫明所撰。）

晚明士人除了強調《孝經》的政教功能，還凸顯它的宗教神聖性。第四章分兩部份：一、從孝的宇宙秩序觀與文明譜系、孝的境界與工夫兩方面，討論虞淳熙作品所呈現的孝論意涵；二、試圖進一步探討虞淳熙孝論的複雜文化脈絡，並說明其與晚明陽明學的密切關係。（頁133）陽明心學宣揚的「良知」和「萬物一體之仁」等概念被晚明孝論廣泛借用，「孝」被推為宇宙秩序根源和人倫規範準則。虞淳熙以禮為依歸、日常實踐、講究正心修身的孝論，也體現晚明三教融合的時代思潮。第五章以呂維祺、楊起元、潘平格、許三禮和黃道周為個案，展現《孝經》在特定的儀式中，被實踐者通過它與天帝神靈進行溝通。

題為「晚明到民初的變化」的第三部包括第六至九章，其中第六、七章關注明清之際《孝經》學的延續性和詮釋觀點的變化。《孝經》作為清初統治意識型態的重要內容，被列入科舉必試科目，晚明士人的訴求在清初才得以實現。作者又以《孝經》學重鎮江浙、河南為例，考察清廷「孝治天下」的國策落實到地方的具體情況，發現河南士人積極呼應朝廷推行《孝經》的政策，而江浙學界卻未見重視《孝經》。第七章通過分析晚明至雍正年間產生的《孝經》學著作，探討明末清初《孝經》學的發展及詮釋觀點的變化，歸納出兩種最主要的變化趨勢：一、過濾陽明學；二、觀點逐漸由多元轉向一元。這種「過濾」受整體學風轉變的影響，並非全出於朝廷政治的干預；

康熙《御定孝經衍義》的頒佈促使後來的詮釋觀點回歸朱子學；在明顯的學術斷裂的表象外，從晚明到清初的《孝經》學仍有着學術傳承的延續性。上述兩章展現了思想的內在理路和外緣政治對學術的影響，凸顯理學與經學的緊密關聯。

第八章探討清中晚期的《孝經》學發展，分三部分：一、清中晚期的《孝經》學反映了乾嘉考據學的興趣，日本傳入的《孝經》文本，使《孝經》今古文問題成為學界的關注焦點。二、清中葉後《孝經》學逐漸鬆脫意識型態的籠罩，重現晚明注釋，觀點趨向多元。三、《孝經》的宗教性意涵不再被主流學界關注，但它在民間宗教中一直延續。清儒對待日本傳入的《古文孝經孔氏傳》和《孝經鄭注》的不同態度，反映他們崇拜鄭玄的心理。或受此心理影響，阮元對《古文孝經孔氏傳》採取排斥的態度，直接導致阮刻十三經注疏本的《孝經注疏》留下了原可避免的失誤（李隆基注，邢昺疏，金良年整理，《孝經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點校前言〉，頁8）。明清《孝經》學的發展反映了主流學術思潮的變化，呈現時代學風對文獻詮釋方式的影響。

帝制中國向現代過渡，傳統文化受到西方價值的猛烈衝擊，傳統人倫秩序「孝」與儒家經典《孝經》如何被時人表述，是第九章關心的問題。清末民初《孝經》的論述出現兩種趨向：文化保守派捍衛孝道時，多已接受民主、自由等價值，而地方性的尊孔組織繼承了傳統觀念和作法，賦予《孝經》宗教色彩，批判西方價值觀。以上情形引發我們思考：在新舊交替往復之際，有多少傳統因素在西潮沖刷下倖存？傳統以何種方式保留下來？

結論部份的五個標題「（《孝經》）與政治的密切關係、經典詮釋與主流思潮的交涉、文本實踐的多樣性、跨越宗教界域的《孝經》、傳統到現代的變遷」大體涵蓋了全書的主旨。作者在「孝道與《孝經》」的視野下觀察現當代傳統觀念的轉變，體現了歷史學者對當今社會的人文關懷。

本書每章均開門見山，結尾有綜述或小節，極利於讀者迅速掌握全書要旨。作者在行文中透露，嘉靖、萬曆年間是《孝經》學興起的重要時期。大力提倡《孝經》的江浙士人沈淮、朱鴻等人前半輩生活在嘉靖朝，但本書似未留意嘉靖朝提倡孝道的統治理念（表現為大禮議、孔廟改制等）與士大夫從事《孝經》研究的關係。或許由於資料限制，作者也沒有深入研究明清民間的《孝經》信仰與主流《孝經》學的互動關係。我們仍未清楚，在精英思想學術外，明清民間如何表述《孝經》的宗教性意涵。清中後期的《孝經》宗教性崇拜，究竟是明清民間信仰自身的延續，抑或是作者所主張的從晚明

主流學術轉嫁而來，仍待進一步探索。另外，在晚明《孝經》學普遍受陽明學的影響時，也存在江旭奇「是非一斷以朱子」（頁123，注釋96）的《孝經》研究著述。閱讀本書時，我們應留意精英階層內多元聲音的存在。還可補充的是，2012年中國人民大學劉增光的博士論文以《晚明〈孝經〉學研究》為題，可資與本書參合。

呂妙芬早年所著的《胡居仁與陳獻章》（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注重哲學史進路，而《陽明學士人社群：歷史、思想與實踐》（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則採取社會文化史路徑，探討陽明學派的形成過程。《孝治天下》是作者從文化史的角度研究經學史的新嘗試，既呈現思想學術的變遷過程，又描繪出一幅思想家與民眾的生活史。細品此書，應該會加深學界對明清以來社會與思想學術變遷的認識，啟發研究者從中國歷史脈絡裡追尋影響深遠的社會觀念和思想行為。

龍偉明

中山大學歷史系

鄒怡，《明清以來的徽州茶業與地方社會（1368-1949）》，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365頁。

不論在中國或日本學界，20世紀中葉以降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深入都與資本主義萌芽討論密不可分。對資本主義萌芽的判定，主要有兩個要素：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正如李伯重指出，早期研究較偏重生產關係而忽視生產力層面。近十幾年的研究相當程度地補足了對生產力的研究。不過，就資料與研究路徑而言，在對生產力的評估中，顯然對資本、勞動力投入的分析要強於對生產技術的分析，而生產技術分析中對糧食作物的研究又遠比其他生產細密。這當然與傳統時代的經濟條件有關，糧食總是人們最關心的內容，其他很多工商行業的技術、行業形態，都難以覓得充分的資料予以說明。

在這樣的背景下，鄒怡這本以徽州茶業為研究對象的著作就相當具有吸引力。明清時代徽商行遍海內，由這一商人集團操持者有四大行業：鹽、典、茶、木。茶佔其一，是徽商貿易之要角，尤其是清代中葉以後外銷茶興起，更在近代經濟史上具有顯著地位。以往研究徽商涉及茶業亦不在少數，是著難能可貴之處是將茶業作為一種產業並對其形態與技術展開分析。